补习 家长走不出的囚徒困境

数据挖掘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原春琳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贾男是一名小学生的母亲。孩子上学后不久，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目前国家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免学杂费政策，按理说，相比高中和大学，小学和初中上学不用交费，家庭教育支出应该是最少的，可是随着孩子年级的增加，她自己和周围的很多家长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投入反而越来越多。

如果说，为使子女在基础教育阶段获取相对优势地位，家庭具有强烈的校外教育投资动机，那么，随着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的出台，我国不断加大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共教育投入，2014年全国普通小学和初中的教育事业费支出、公用经费支出增幅均高于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等学校的相应增幅。

这位劳动经济学者又开始算另外一笔账——为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多，这是不是意味着家庭的教育支出可以减少了？

带着疑问，贾男和她的博士研究生刘国顺，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的资助下，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研究。仔细分析了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基线调查（2013～2014学年）数据库提供的4万多份问卷——它们以初一和初三年级为调查起点，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28个县(区)112所学校438个班级的样本，最终有效样本为19487名学生、19007名家长、1412名老师和112名学校负责人，贾男和刘国顺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生均公用经费最多或最少的地区，家庭校外学习班参加率和支出更多。而在生均公用经费向平均水平趋近的地区，家庭的校外学习班和补习班的参加率和教育支出都是下降的。

校外教育补习服务已成生活必需品

贾男和刘国顺的研究把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分成两类：一类是购买课外书籍、学习资料、学习用品等；另一类是参加校外兴趣班和补习班（以下统称为“校外学习班”）。其中，校外兴趣班主要是指艺体类的培训，常见的有乐器、舞蹈、声乐、美术、球类、棋类等，校外补习班主要是指与校内主科学习一致的学习班，包括阅读、作文、奥数、普通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在这两类教育支出中，校外学习班更为正式，也是校内教育的‘影子教育’。”贾男说。

“影子教育”成了家庭教育的最大支出，它的“面积”显然也在不断扩大。北京大学一位学者通过对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发现：2012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校外教育参与率总体为24.6%，其中，城镇为55.5%，部分较发达省份达到73.8%。

贾男和刘国顺的研究则显示，这一比例在逐渐增高。在他们调研的2013～2014学年，29.74%的初中生参加了校外学习班。其中，13.11%的初中生参加校外补习班（主要是数学、语文、英语），3.35%初中生只参加了兴趣班，还有10.01%的初中生同时参加了校外补习班和校外兴趣班。

在他们的调查中，校外教育支出的平均值为1226.11元，其中支出最少的为每年零元，支出最多的达到每年9万元。“校外教育补习服务已不是‘奢侈品’，而是一种生活必需品。”贾男说。

“事实上，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校外补习现象已非常普遍，甚至形成了支出竞争。”贾男说，这使得家庭在是否参加校外学习班和补习班的决策上犹如陷入“囚徒困境”——学与不学都是进退两难：学了之后也不知道是否对孩子有好处；不学则是对孩子不负责，毕竟，其他孩子都在学。

富裕或贫穷家庭的校外学习支出费用相对更多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学校维持师资力量和保证学校正常运转的支出也更高。他们的研究发现，2006年实施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使地方教育经费被固化于既定结构中，弱化了地方对教育经费使用的自主决策权。这使得学校经费与学校管理的关系脱离于地方当期的经济水平，经费的充足与否并不会因地方经济水平而有明显差异。同时，在社会经济、财政和教育财政相同的情况下，学生规模越多，地方政府的生均公共教育投入水平越低；而在义务教育完全普及的情况下，地区的学生规模和经济水平并不直接相关。

进一步研究后，贾男和刘国顺发现，家庭的校外学习班参加率和支出都随生均公用经费的增加呈“U型”分布，即先降低后升高；增加生均公用经费对家庭校外学习班和校外补习班支出的影响，是先“替代”后“互补”。

贾男解释，国家给钱较少时，随着给钱量的增多，自己就减少教育支出，这是替代的关系；国家给的钱多，自己还要付出更多，这是互补的关系。

贾男和刘国顺的研究认为，生均公用经费对家庭校外学习和补习行为的影响不是单纯的替代或互补，而是总体呈现U型、从替代转向互补的关系。他们的研究发现，在生均公用经费平均水平以下，随着生均公用经费增加，家庭倾向于降低校外学习班参与率和教育支出；而在平均水平以上，会刺激家庭增加校外学习班和补习班参与率，并提高校外教育支出。

换句话说，在生均公用经费从低、高两端向平均水平趋近时，家庭的校外学习班和补习班的参加率和支出都是下降的。当生均公共投入中等水平覆盖的范围越广时，会有更多的家庭降低私人教育投资，表现为补习率和补习支出的下降。贾男认为，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或许有助于理解家庭教育支出随公共投入增加呈现出的增减变动。如我国的课外补习对于城镇家庭主要是培优型，但对于只能进入一些薄弱学校学习的城市务工人员的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课外补习能提高他们的成绩。而对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课外补习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与公立学校在教育质量上的不公平与不均衡。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生均公用经费极少时，家庭教育支出反而增加的原因。

“这就是我们目前描述的现实。”贾男说，特别穷的或者特别富的家庭，校外学习支出费用相对更多——这个多与少是相对量，与各自收入相关。究其原因，贾男解释，富裕家庭希望孩子享有精英教育，贫穷家庭希望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家庭，在阶层流动方面没有那么迫切，所以教育支出的变化幅度没有那么明显。

增加地级市层面的教育投入更有利于降低家庭教育负担

刘国顺说，通过进一步的分城乡研究发现，生均公用经费增加，会促使农村家庭增加校外学习班的参加率和支出，而对城区学校的家庭影响是标准“U”型的，其中，生均公用经费增加只对地级市城区学校的家庭校外学习班支出有“替代”效应，在直辖市、省会城市、县（县级市）城区，家庭校外学习班支出是增加的。考虑到城区学校的分布事实上以地级市为主，则生均公用经费增加，应该是整体上降低了城市家庭校外教育支出。因此，在城市均衡公共教育投入，特别是增加地级市层面的教育投入，更有利于降低家庭教育负担，减缓城市人力资本投资上的竞争。需要说明的是，农村家庭和城区家庭在提高校外教育的参加率和支出上，有着根本区别，前者目的是补差，后者是培优。这说明国家在农村教育领域积累的欠账太多，现在虽然增加了对农村的公共教育投入，但增加的力度和积累还远远不能弥补城乡教育资源上的固有差距。

贾男和刘国顺的研究也提醒，事实上，教育投入上的整体扩张政策未必都能促进社会公平，由于家庭因素的影响，教育资源在代际传递上的U型趋势，不仅在现阶段存在，历史中同样如此。

为此，贾男和刘国顺的研究给出三条政策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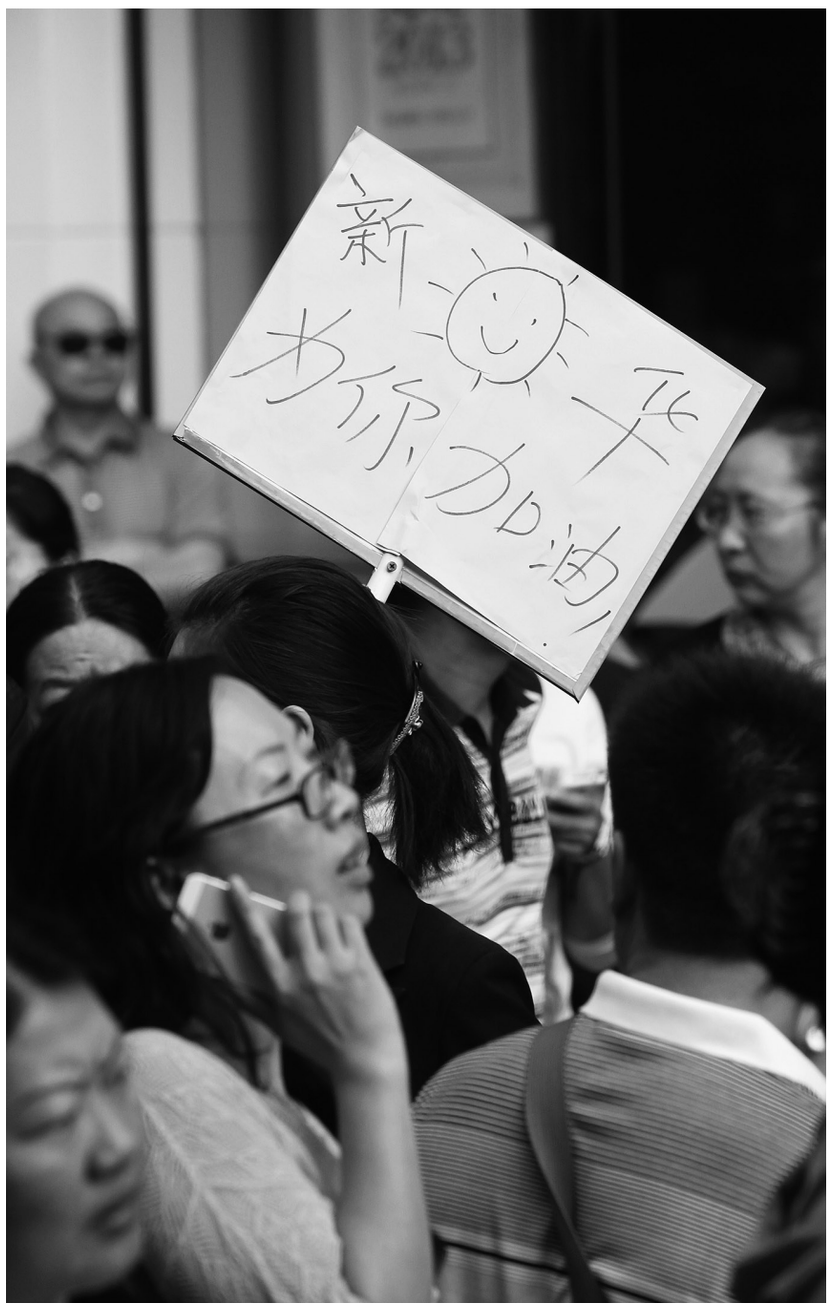
第一，义务教育经费“三增长”政策措施，在不同地区对家庭校外教育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投入高的地区(往往是发达地区)会强化家庭间的教育支出竞赛。对此，贾男解释，对于教育资源已经集中的地区来说，一些已经处于更高阶层的家庭如果想让自己的状况更好，只有让孩子接受更精英的教育，而现有的公共教育资源不能满足需求。所以他们只能通过更多的家庭教育支出，实现向更高阶层的流动。

第二，即使在公共教育投入差异不大的同地域内，增强校际间的师资力量流动，避免高、低职称教师扎堆儿，也有利于减轻家庭在校外教育上的竞争。尽管已经全面普及了义务教育，但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还存在明显差距。“正是现在教育发展不够均衡，各地差异比较大，才导致大家都想追求好的教育资源——差的想好一些，好的想更好。”贾男说。

所以，他们的第三点建议是，在“地方办学为主”的义务教育体制下，国家要进一步推进均衡发展战略，有利于打破人力资本的地域固化，缩小家庭通过校外教育进行优势资源代际传递而形成的教育差距，有利于教育结果公平的实现。

编者：我们希望这里是真正的圆桌会议，尽量接近理性，尽量远离口水，尽量富于建设性，谈论那些从胎教开始就争论不休的教育问题。为此，我们拉出一张“教育圆桌”。

jiaoyuyuanzhuo@sina.cn，等你发言。



云南昆明，云大附中举行“小升初”测评考试。在考场外，“小升初”补习学校的老师也来为学生助威，毕竟“小升初”考试成绩直接影响着补习班下一届的开班招生。

视觉中国供图（资料图片）

北京仍然受到重污染的“霾伏”，但仍有不少人顶霾外出，这其中就包括许多带孩子上校外培训班的家长。

视觉中国供图（资料图片）

华山论剑

有偿家教的口子还是不开为好

张双全

《中国青年报》教育圆桌版3月6日刊登了赵成昌老师的《有偿家教禁不住 一线教师有话说》一文。赵老师在文中说，现在要求家教的多半是家长，有偿家教堵不住，建议对有偿家教适当放开。

对这种说法，笔者不敢苟同。现在确实有一些家长找老师给孩子补课，笔者多年前也为个别学生辅导过——当时实在不好意思拒绝熟人。但自那以后，笔者发现，教师辅导学生已经变了味，之后，再有人找上门来，笔者都坚决不辅导。

在笔者生活的地方，家长找上门来要求教师辅导孩子的事情毕竟是少数。前几年，笔者在校园里经常见到的现象是这样的：放假前几天，一些老师就抱着一摞花花绿绿的纸，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把一沓子纸放到班主任的桌子上，并跟班主任耳语一番。之后，班主任们就拿着纸到教室里，发给学生，并动员一番。这些发给学生的纸是假期招生广告。

有的教师强迫自己所教的每一个学生都要参加，不参加的在下学年里就会受到“特殊照顾”。笔者的一位亲戚就曾向笔者抱怨过，孩子的老师强迫孩子参加老师暑假举办的作文辅导班，如果不参加，就会怎样怎样。对此，他很是气愤。

学校老师假期办辅导班，引起了一些家长的不满，有的家长举报到当地教育局。教育局又反馈到学校，学校领导找他们谈话。但是，因为学校没有什么权力处理，假期办辅导班的几位老师还是我行我素。

虽然假期办辅导班的就那么十来个老师，但是，在家长中造成的影响十分恶劣，一些家长对教师很有怨言。

而前几年，笔者所在的北方某县城，教师周末、假期办辅导班的风气更厉害：一到节假日，满大街的都是背着书包补课的学生。一些教师见了面，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办班了吗？辅导班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的教师采取在课堂上留一手的办法，逼迫学生参加辅导班；有的在家里设置小饭桌，让学生参加自己的辅导班；有些教师互为掮客，把所教的学生互换进行辅导。

假期、周末有偿补课，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家长对此极为不满。记得当时开例会时，有位校长气愤地说：“你们就讲点良心吧，现在矿上的职工几个月不开钱，你们还要人家的孩子交那么多钱，上你们的辅导班！”

近一两年来，教育部门对有偿补课的要求越来越严了，那些假期补课的老师不敢那么明目张胆，有的由公开转为地下，但是，还是有个别教师仍在进行有偿补课。

在笔者看来，现在家长找教师补课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因为孩子学习成绩差，家长又没有能力辅导；有的是因为孩子不能完成老师在周末、假期布置的作业；还有的孩子本来学习不错，家长想让孩子考一个好学校……

但是，主动找教师补课的家长毕竟是少数，不能因为少数家长想找老师辅导孩子就要求重新放开教师有偿家教的口子。虽然有的地方开始试点，并制定了一些措施，但是，谁能保障这些措施能落到实处？监管部门确实能做到监管到位？办班教师能够做到自律吗？有谁能保障有偿家教的口子一开，不会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并且，像某些一对一的家教，收费昂贵，一般家庭承受不起，这也会造成教育的不公平。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任何措施都会有“挂万漏一”。有偿家教也有其需求，但是，有需求的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不能因为有需求，就让一些不正确的东西放任自流。

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任课教师应该在校期间积极采取措施，帮助其赶上，而不能采取有偿补课的形式。至于有偿家教能否禁住，这既要看教师的师德，又要看教育部门能否铁面无私的严格禁止。（作者为基层教师）

这样的作文比赛没有也罢

一线来信

孟雪罡

笔者的妻子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最近一段时间，她和班上的学生被一场学生作文比赛搞得身心疲惫。

某小学生作文比赛在我们省的影响力很大，不仅是因为该作文比赛的参与学生多、知名度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本地一些重点初中把该作文比赛的成绩作为录取新生的一项重要参考条件。虽说早已不允许小升初“择校”，但实际情况学校和学生家长都是“懂得”的。

正因如此，对这种能影响孩子“前程”的比赛，学校都很重视。新学期一开学，妻子所在学校的领导就把五六年级语文老师召集到一起开会，要求利用每天中午时间给学生上作文课，对学生进行强化训练，确保学生在本次作文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中午原本是学生午休时间，改上作文课后，小学生的“生物钟”一时难以适应，学生精神状态不佳，课堂教学效果可想而知。部分学生因为中午没休息，在下午上课时打起了瞌睡。学生原本每周交一篇作文，强化训练开始后，改成每两天交一篇作文。不要说小学生，就是中学生完成这项作业恐怕也会有些吃力。面对高强度的作业量，绝大多数学生都是东抄抄、西凑凑，作文质量自然无从谈起。

为准备作文比赛，语文教师更是无比辛苦，不但中午要加班，更大的工作量是在批改学生作文上。批改一篇作文的时间至少在8分钟左右，按每个班平均40名学生来计算，批改一次全班作文至少要5小时。为了完成强化训练任务，教师们除了批改正常的语文作业，每天晚上——甚至双休日都要加班加点批改学生作文。时间完全被占满，他们根本无暇去对学生作文存在的问题进行科学分析，研讨制定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案。有的教师甚至因此影响到正常的语文教学。

学生家长也没闲着。他们有的为孩子买回一堆作文辅导资料，有的为孩子报了作文课外辅导班，再加上比赛所需的报名费，参加一次这样的作文比赛，学生家长花销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

为准备一场小学生作文比赛，学生们牺牲了正常午休、双休，疲于应付赶写“八股式”作文，对作文那点兴趣也被没完没了的习作早早扼杀了；老师们透支了体力、精力，疲于应付批改作文；家长们则浪费了金钱。

在笔者看来，提高学生作文水平无外乎两方面：一是多接触生活；二是多读书。没有对生活的感悟和阅读积累，是不可能写出真情实感的好作文。

这样的作文比赛没有也罢。

（作者为铁路职员）

一家之言

过程教育的缺失让创新只能成为偶然

谢 耘

自西方借助工业革命的成功打开中国农耕社会的大门之后，我们便长期陷入了疲于奔命的追赶之中。追赶固然难以潇洒，但是却有一个巨大的便利，就是几乎一切都有领跑者在为我们做着示范。追赶的过程几乎都是确定的，不必面对创新所带来的那三个不确定的未知——创新所指向的方向的正确、合理与可行性的未知；创新应该采取的具体方法路径的未知；创新落实的最终具体形态的未知。

追赶形成的与创新相悖的惯性，让历史成为替罪羊，让教育成为指责的对象。因为历史无法改变，教育便成为焦点。如何让教育有效地促进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在我们跨入超越与引领的发展新阶段时，确实具有重大的战略性意义。在指责教育不足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给出具体的改进措施。

面对创新的挑战，我们的教育，最大的不足在于注重确定性知识的传授，确定性问题的解决，而缺少对学生面对不确定性的未知的认识和探索的勇气与能力。

学校目前传授的，基本都是被充分验证并广泛应用的确定性的、主流的知识。毫无疑问，传授这些人类积累下来的宝贵的知识是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知识是人类探索的结果，而不是探索的过程。仅仅传授结果，并不能有效地培养受教育者自己去探索未知的意愿与能力。教育在展示人类探索创新的结果——知识的精妙的同时，却遗漏了人类探索创新过程中是如何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的——那些挫折失败的教训与攻坚克难的经验，走投无路的绝望与柳暗花明的激动，百折不挠的顽强与孤独寂寞的坚守。这些比知识更加宝贵的、比知识更加动人心魄的人类探索未知、积累构建知识体系的实践过程，缺少有效的途径代代相传，被确定性的知识掩盖在历史的尘烟之中。

教育的这种缺失，使得被传授的知识成为死的标本，而不是一个鲜活的、有自己诞生成长的历史更有待开拓的未来的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死的标本固然依然是有效的工具，但同时也可能成为一种不自觉的禁锢，无法激发出新的发展。

在知识的传授过程中，不论是平时的练习还是检验学习效果的考试，学生解决的，都是确定性问题——在所学的知识范围内，一定有明确答案的问题。所以，不论问题有多难，也不论学生是否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找到问题的答案，在学生的内心深处，在他的潜意识里，都有一个毫无质疑的确定性前提假设——这个问题在所学的知识范围内一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不仅问题的答案是确定的，解决问题而需要的知识边界也是确定的。

当学生长期经受这样的训练后，他所习惯的自然是去寻找一定存在的那些确定的答案，而不是去探索不确定性的未知。在心理上甚至会本能地回避、排斥面对不确定性未知的局面。同时在能力上，这样训练出来的思维方式，也难以适应去探索不确定性的未知：问题本身就是模糊的，无从知晓在什么范围内会有问题的答案，甚至也无法事先确定问题是否会有一个答案。而这正是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给我们带来的核心挑战。

教育的缺失，使得创新更多地成为依赖个人天赋与特别机遇的偶然，而不是系统培养训练的大概率结果。所以，如果期望教育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创新，更加有效地培养出能够从容面对创新带来的挑战的、具有开疆拓土能力的人才，那么教育在有效地传授确定性的、已有定论的知识内容，让受教育者通过解决确定性的问题来消化理解这些知识，并以此来衡量其对知识的把握程度的同时，更要结合知识的传授，将人类在构建积累不同领域内知识体系的探索创新的典型实践过程，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及对实践过程的理性认识与提高，以及学科最新的、尚无定论的探索，有效地传授给受教育者。再现学科知识那鲜活的生命活力，让受教育者能够更加自觉而有效地继承与发扬前辈开拓创新的精神与实践；同时在传授知识、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引入适当比例的、解决开放性问题的训练，培养锻炼受教育者探索未知、解决没有预设答案的开放性问题的能力。

虽然对现有的教育体系如何有效支撑创新我们还可以在众多的方面提出各种质疑与建议，但是上述两项内容应该是最具核心与关键意义的措施。当然，这两个措施的落实对于教育系统极具挑战性，它们本身就具有创新意义。这方面在国际上有一些可借鉴的经验与做法，但是不存在完整的系统性方案。以创建国际一流大学为己任的高等院校，应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个历史性的责任。如果教育机构自己都无法实现在教育领域内的重大创新，那么有效地为社会培养创新型人才就成了天方夜谭。

（作者为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